学术专论

论清代奉天地区的市钱

任玉雪　武洋

[摘要] 清代区域市场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货币体系，被称为市钱。清朝存在一个以小数钱（东钱）为市钱的经济区，以奉天省为中心，辐射到与直隶、内蒙古、吉林等相邻省份的交界地区。本文以小数钱为例，论述了奉天地区市钱的出现及其演变过程，首次系统地梳理了乾隆以降小数钱与制钱和银两的比价。笔者推测支撑市钱货币体系活力的是各种店铺发行的纸币，这种非官方性质的纸币按照市钱的货币制度流通，形成一个庞大的纸币市场，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

[关键词] 清代　市钱　奉天地区　小数钱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14）－04－0013－15

一、问题的提出

清代区域市场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货币体系，被称为市钱，市面用钱之通称①。各地市钱的实体往往就是制钱，但两者的钱法存在本质区别。市钱并非是国家发行的新货币，与制钱的根本区别在于单位“吊”所表示的价值不同。制钱 1 吊代表的价值是官铸铜钱 1000 个，市钱 1 吊代表的价值是官铸铜钱 100 至 1000 个不等，按照各地的习俗而定，有人认为清代共有 20 余种市钱②。1889 年皇家亚洲文会曾按区域调查“吊”表示的价值，即是对各地市钱制度的调查③。

在清代约定俗成的观念中，将各地市钱笼统的分为“长钱”、“中钱”、“小钱”。一般认为长钱每吊约合制钱 1000 个，实际上，有些地方的长钱每吊仅合制钱 700 至 900 个；中钱每吊约合制钱 500 个；小钱每吊约合制钱 100 或 160 个④，有学者直接将长钱、中钱、小钱视为清代的三种铜钱制度⑤。

[收稿日期] 2014－03－16
[作者简介] 任玉雪（1972—），女，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240，renyuxue@sjtu.edu.cn；武洋（1989—），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240，wuyangsjtu@gmail.com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1YJC77045）基金支持。

① 卫挺生《清季中国流行之货币及其沿革》，《清华学报》1924 年第 1 卷第 2 期。
②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 年，第 62 页。
③ H. B. Morse, *Abstract of information currency and measures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90，上海图书馆整理《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第 13 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404 页。
④ 卫挺生《清季中国流行之货币及其沿革》，《清华学报》1924 年第 1 卷第 2 期；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第 62 页。
⑤ Frank H. H.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845—189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65, pp. 58—65.

市钱的分布有着明显的区域性，皇家亚洲文会在 1889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钱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包括山东、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吉林等省，小钱则以奉天省为中心，其余地区则以长钱为主①。

学界已经了解到市钱的存在，但对其形成的原因和性质还存在众多分歧，主要有四种观点，其一，认为市钱是短陌的制钱，在铸币缺乏的情况下，市场逐渐接受短陌的制钱，即支付时可以少于法定数目若干文，以较少的数称为百、串（吊）等②；其二，认为京钱、东钱等市钱是虚货币，认为钱法不同的计算制度，可能是清朝政府清理私铸小钱的过程中产生的，虽然地方货币体系最后对应的都是制钱，但起初对应小旧等实钱是很可能的③；其三，认为东钱不仅是短陌的制钱，其“表现形式由起初的制钱演变为钱票直至铸币的出现”，东钱票并非只有制钱作为其发行的准备金，在不同的时期还出现白银作为准备金的情况，光绪二十五年还出现东钱铸币④；其四，东钱是以银为本位发行的东钱票⑤。

关于市钱的研究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这不仅可以促进对清代货币史的认识，也可为物价和赋税等方面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坐标。本文将以清代奉天地区⑥的市钱为例，探讨市钱体系的出现与运作模式，以及市钱与制钱、银两等本位货币的兑换关系。

说到奉天地区的市钱，一般会想到东钱，实际上，“小数钱”的名称出现的更早，并一直被地方政府沿用。学界对小数钱的了解不多，20 世纪 50 年代，杨联陞曾注意到 19 世纪东北地区使用一种特别小的串钱，一串大约有 160 个铜钱，叫小数钱⑦，可惜仅是寥寥数语而已。笔者虽然没有在清朝文献中找到小数钱即是东钱的记载，但本文关于清代奉天市钱的研究证实，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

笔者推测，东钱可能是对小数钱市钱体系的俗称。虽然关于东钱出现时间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康熙年间，但这些方志文献多成书于清末或民国年间，存在二次编辑，产生误差的可能性增大⑧。本文以历史档案的直接记录为依据，发现关于小数钱和东钱的最早记载，分别始于乾隆四年⑨和嘉庆八年⑩，在赋税、薪酬、物价及银钱比价等各种官方记录中，道光朝以前小数钱出现的频率远远多于东钱；同治、光绪年间，东钱的使用频率明显提高，但光绪三十余年盛京将军奏报银钱比价时，仍然使用小数钱的名称。笔者推测，清代奉天地区的市钱最初称作小数钱，并一直被地方政府及民间沿用，东钱的名称出现稍晚些，很可能是民间对小数钱的俗称。

鉴于小数钱出现的更早，并一直被地方政府沿用，相关的资料也更多些，本文将以小数钱为线索，探讨清代奉天地区市钱体系。由于缺乏足够的历史文献的支撑，完全弄清楚小数钱的货币

---

① H. B. Morse，*Abstract of information currency and measures in China*，PP. 414—419。

② 陈明光 《“短陌”与“省陌”管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日］岸本美绪著 《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刘迪瑞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297 页；孙文泱 《短陌性质初探》，《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3 期；［日］山本进 《清代东钱考》，《史学杂志》2005 年第 3 期。

③ 彭凯翔 《“京钱”考》，《江苏货币》2013 年第 2 期；黄冕堂 《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齐鲁书社，2007 年，第 9 页。

④ 程鹏 《清代东钱考》，山西大学 2011 年硕士毕业论文，第 9、13、17 页。

⑤ ［日］佐々木正哉 《营口の商人研究》，《近代中国研究》（第 1 辑）1958 年第 4 期。

⑥ 奉天地区是指清末奉天省所辖区域，包括建省前的奉天将军和奉天府辖区，主要地区位于今辽宁省。

⑦ 杨联陞 《中国货币及信贷简史》，刘梦溪主编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陞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第 603 页。

⑧ 程鹏 《清代东钱考》，第 31 页。

⑨ 户科题本，乾隆四年二月十九日盛京户部侍郎双喜等题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4－13159－002。（以下户科题本档案均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⑩ 朱批奏折，嘉庆九年三月十二日盛京将军富俊等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8－0163－057。（以下朱批奏折均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制度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本文将利用大量的历史档案，分析清代奉天地区地方货币的出现、使用及价格变化情况。

二、小数钱在奉天地区的使用情况

清代关于小数钱的记载十分零散，从现存的档案资料来看，小数钱作为赋税征收的货币单位，有确切记载是从乾隆四年（1739）开始，小数钱在奉天地区的广泛使用应该远远早于这个时间点。另外，民间土地交易、工资等记载中，也提到使用小数钱。可以肯定，最晚在乾隆初年，奉天地区的小数钱已经成为市钱，在市场中广泛流通并被普遍接受。

1. 小数钱与赋税征收

乾隆年间与小数钱相关的赋税征收记录，多是与杂税相关，包括牛马税（牲畜税）、苇税、蚕税等，征收过程往往与市场密切相关。

奉天地区的牛马税又名牲畜税，是对市场中交易的各种牲畜及肉类征税，由税课司征收后上交盛京户部。如果超出定额，征收官员将受到奖励，相反官员会受到处罚。据雍正朝的《会典》记载，清初山海关外牲畜每两纳银三分，每年定额二千两，雍正二年（1724）增至四千两①。由上述可知，牛马税最初征银，并在雍正二年定额增加一倍。牛马税与市场交易十分密切，定额的增加可能与市场的繁荣及官员的积极征收有关。

乾隆四年，户部关于奉天地区牛马税的讨论与改革表明，小数钱已经是市场中广泛流通的货币，官府允许以小数钱交税，征税人员将征齐的税款兑换成银两或制钱后，上交盛京户部。是年，北京户部指责奉天地区“一猪征收四税”，渔利百姓，盛京户部侍郎双喜就此做出解释，多次提到小数钱:

> 双喜等疏称：圈税系碾磨、油房等铺圈养货卖之猪至三十斤，方向卖猪人每口征落地税小数钱九十文；鞭税系贩户从四乡贩来入城者，每口向贩户征收落地税小数钱一百文；汤税系屠户买宰之后，每斤收大制钱一文；再开设饭铺人等买猪，向买猪人按价小数钱每千文收小数税钱六十文，其小饭铺向屠户买肉零售，并不征税；共［供］旗民买猪食用，向买猪人按价小数钱每千文收小数税钱三十文，以上虽有四项税名，其实只向贩户、圈户收落地税一次，向买用之人收税一次而已，并无一猪征收四税。今臣等愚见，请将鞭猪、圈猪之落地税仍照旧例，向卖猪收税一次。其屠户并饭铺人等赴市买猪，嗣后照旗民人等买猪食用之制，按价小数钱每千征小数税钱三十文，屠户饭铺人等汤税名色永行禁革。②

由上述材料可见，乾隆四年奉天地区市场中猪的买卖广泛使用小数钱，盛京户部亦允许以小数钱交纳杂税。其中圈税和鞭税是落地税，每口分别为小数钱 90 文和 100 文；饭铺和旗民买猪按成交价征税，每千文小数钱征税 30 文。笔者认为，官府之所以允许民众以小数钱交纳牛马税，是因为市场中商品以小数钱计价，即小数钱是市场中普遍使用的市钱。因为，税务官员按照市场规则征税更为便利。

小数钱的流通范围十分广阔，不仅在盛京城以小数钱交税，在奉天地区南部沿海的牛庄，也以小数钱交纳苇税。乾隆五年，牛庄地区也因为割草人交银不便，盛京户部允许以小数钱交税，征收机关收齐后再兑换银两交库。早年征银共计 1403.72 两，按牛马税银 1 两合小数钱 6000 文计算③，共征收小数钱 8422.32 千文。

有记载表明，乾隆年间小数钱已是奉天地区的市钱。在乾隆四十六年，盛京、牛庄、盖州、

---

① 《大清会典》（雍正朝，《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79 辑，文海出版社，第 14123—14124 页。

② 户科题本，乾隆四年二月十九日盛京户部侍郎双喜等题请，档案号：02－01－04－13159－002。

③ 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725，《盛京工部・苇税》。

熊岳、复州、金州、岫岩等七城的蚕税也允许以小数钱交纳。规定每个养蚕人纳官山税课小数钱3000文，每1000个蚕茧，商人纳小数钱150文。是年蚕税的定额是6693.88两，如果以银1两合小数钱6000文计算，总计征收小数钱40163.286千文，数量也比较大①。

由上述可知，从乾隆初年开始，小数钱已经成为奉天地区市场中广泛流通的交换媒介，并被官方接受，允许各种杂税以小数钱交纳。小数钱在奉天地区的使用，应该远远早于乾隆初年。

2. 小数钱与日常生活

在乾隆年间的诉讼案件中，可以看到小数钱用于贿赂与工资发放，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价值支付手段。

小数钱被用作贿赂手段。乾隆六年，盛京骁骑校胡勒思肯被参，原因是在抓赌的过程中接受赌博人犯梁德的贿赂，总计小数钱四十九千，共合银八两一钱②。

乾隆九年奉天将军额尔图被御史参奏，起因是为接待皇帝向八旗兵丁及商铺等强征银两和小数钱，其中提到:

> 一，藉办差为名……将奉天兵丁五千余名，每名应领十二两全数坐扣，其各城兵饷亦多坐扣；一，八旗屯庄，每壮丁一名，派小数钱一千二百文……仍令十四城城守尉，于所属每壮丁派小数钱一千文……一，勒派铺户，每门面一间，自银一两至小数钱一千文不等。③

由此可知，乾隆九年奉天将军因为向官兵、壮丁及商铺强征银与钱，被御史参奏，这里的钱，是指小数钱。看起来，小数钱是与银两一样是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的货币。以此推测，乾隆初年开始，奉天地区往往银两与小数钱并用。且当时可能大额花费用银，小额则用小数钱计算。

乾隆中期民间的工资计价，已经使用小数钱为单位。乾隆二十四年，盛京地方旗人杨自富曾雇佣苏四锄地，后来因为“拖欠工价小数钱一千文未偿”，两人发生争斗，苏四身死，杨自富被处以绞刑④。另外，乾隆三十八年奉天府开原县清河屯的徐秉忠，在肥屯舅父家里呆一段时间，在各处卖了十几天工夫，共得了四千五百小数钱工钱⑤。

在户科题本记载的嘉庆与道光朝的几起私典旗地案，都提到用小数钱交易。嘉庆十二年(1807)盛京旗人沈铭等四人违例私典旗地，典价的货币单位是用小数钱和银两，共计小数钱12265吊，银449两5钱⑥。在道光十二年(1832)另一起违例典地案中，乌力公额曾收典价小数钱6000吊⑦。实际上，嘉庆十一年的一组数据表明，奉天土地交易主要用银和小数钱，是年盛京将军查到旗人将红册地典与民人，土地共计21577.9亩，典价共计银5439两、小数钱316106.26吊，出典旗人872户，受典民人896户⑧。由此可见银两之外，小数钱已经成为奉天土地交易市场的主要定价货币。

小数钱在市场中广泛流通，并被官方接受和使用，有记载表明，道光、咸丰之际，已经成为官府的储藏货币。据《清实录》记载如下:

> 奉天各厅州县仓库，自道光二十八年清查后起，截至咸丰十一年止，统计各属仓库，共亏银十四万七千二百余两，票银三万三百余两，制钱十一万四千一百余串，小数钱九千二百

---

① 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95，《户部·杂税》。

②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乾隆六年六月六日刑部尚书兼内务府总管来保题参，台湾“中央研究院”藏，登陆号:071110-001。

③《清高宗实录》卷218，乾隆九年六月辛酉。

④ 何溥滢《清前期满族旗地经营方式的考察》，《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2期。

⑤ 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清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第17页。

⑥ 户科题本，嘉庆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盛京将军富俊等题，档案号:02-01-04-18739-009。

⑦ 户科题本，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盛京将军奕颢等题，档案号:02-01-04-20516-004。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查办盛京民典旗地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余串……所有奉天历任欠员，无论在省离省，在任离任，均著先行革职，勒限追缴。①

3. 奉天地区街市银行与小数钱

清朝光绪年间，盛京将军逐月向皇帝奏报街市银行的银钱比价，是市场中广泛流通的钱币与银两之间的兑换比率②。这里的“钱”并非制钱，而是“小数钱”。数据主要来自奉天府城，目前可查到光绪二年（1876）至三十二年的街市银行数据607个③。街市银行的记录印证了小数钱（东钱）在奉天地区市场中的重要地位。

4. 钱帖、东钱与小数钱

钱帖。清代奉天地区普遍使用钱票，也称为凭帖或钱帖。咸丰二年（1852），福建巡抚王懿德奏请发行纸币，曾提到畿辅、山左及关东多用钱票④。学界的研究也显示清代中国北方，包括东北地区，用钱比用银要多，而钱票作为钱的替代物被广泛使用⑤。早期的钱帖多为私帖，由钱庄、当铺、粮栈、油坊、烧锅、杂货店等发行，用作商铺与商铺之间结算债务，以及商铺购买农产品、支付柜伙工钱等⑥。

虽然官方规定制钱1吊为1000文，但各地市场流通的市钱，每吊所合制钱的数量并不相同。因此商业实体在发行钱帖时，往往会特别说明所代表的制钱类型，如街市八底钱、满钱、样钱、九五典钱、东钱、京钱、十足制钱等等⑦。如此一来，持帖人可以凭票按照相应的规则兑换。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清代钱帖没有说明“钱”的性质，仅有“凭帖取钱”字样。一般来说，这样的钱帖与制钱保持复杂兑换关系。如果钱帖没有说明“钱”的所指，即是指当地通行的市钱，而非制钱。如果兑换成制钱，则遵循市钱与制钱的兑换比率。例如同治八年（1869）七月十五日兴京“义发号”发行的凭帖，仅标出“凭帖取钱2吊”⑧。这里的“钱”，应该是清代兴京地区普遍使用的市钱，即是指凭帖取小数钱2吊。如果以制钱160个当小数钱1000文计算，2吊小数钱相当于制钱320个。这也意味着在市场的流通中，“凭帖取钱2吊”的纸币与320个制钱的价值相等，也就是说，2000个市钱对应320个制钱。

奉天地区的钱票是以小数钱为单位，也就是说，钱票是小数钱的替代物，而非制钱，与此同时，钱票像小数钱一样，与制钱保持固定的兑换比率。此外，笔者同意王业键关于钱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信用货币的推测，奉天地区的钱票发行机构，更多的将制钱作为准备金，发行的钱票的数量可能是制钱的几倍。

钱票始于何时？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其一，有人认为十八世纪下半叶以前，私人发行纸币者绝少，大约在鸦片战争前的一个世纪内，钱票开始流通⑨；其二，钱票是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⑩；其三，钱票的普及是在道光年间⑪。保留至今的清代钱帖始于乾隆年间，从嘉庆、道光朝一直延续下来，逐渐增多⑫，显然第一和第三种观点是得到私帖实物支持的。

---

① 《清穆宗实录》卷76，同治二年八月己亥。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6年，第94辑，第95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朝朱批奏折》，第94—97辑，详见表2。
④ 《清史稿》，列传二百十四，中华书局，1994年，第12255页。
⑤ 王业键 《清代经济史论文集》（一），稻香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
⑥ 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哈尔滨市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19页。
⑦ 石长有 《清代地方私帖图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192、273、329、487、698、705、752页。
⑧ 石长有 《清代地方私帖图录》，第158页。
⑨ 王业键 《清代经济史论文集》（一），第165、180页；王雪农等 《中国山西民间票帖》，《中国钱币》，1991年第1期。
⑩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97页；王革生 《清代东北货币金融述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⑪ 戴建兵 《中国钱票》，中华书局，2001年，第2页。
⑫ 石长有 《清代地方私帖图录》，第2—4页。

奉天地区的钱票广泛流通始于何时？学界的观点一般倾向于清代晚期，有人认为是在咸丰以后①，也有人认为是在同治、光绪时代②。如果将市钱与钱票的盛行放在一起考虑，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

在讨论市钱的形成时，有人将市钱与清朝政府清理私铸小钱联系起来，认为市钱起初对应小旧等实钱是很可能的。也就是说，地方市场曾广泛流通私铸小钱、旧钱等劣质货币，后来政府加强对货币的监控，大量的劣质货币退出市场，但市场交易仍按照劣质货币的钱法进行，形成中钱、小钱等虚货币③。实际上，虽然清代市场中随处可见私铸小钱、旧币等劣质货币，中央政府也曾下决心整治，但收效很小，奉天地区的官员甚至以缺少铜钱为由，拒绝推行中央政府清理小钱的决定，长期有效的货币监管从来就不存在。

笔者推测钱票盛行与政府对货币监管不力有关。清代私铸小钱、旧币等劣质货币泛滥，钱票特别受市场欢迎的原因，除了方便携带，还无需支付清点各种品质不一的铜钱的费用④。因此，由于劣质铜钱泛滥使交易成本增加，钱票大受欢迎，在市场中广泛流通。与此同时，为了维护钱票的信用，钱票与官铸铜钱保持稳定的兑换比价，无形中减少了劣质小钱在市场中的流通量。

笔者认为钱票与市钱制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许可以说，市钱制度的拓展是以钱票为基础的。为保证钱票的信誉，商家在发行之初就会明确钱票所代表的货币类型。如果仅有“凭帖取钱”字样，这里的“钱”，一般是指当地通行的市钱，而非制钱。钱票与市钱有着天然的联系，密不可分。有人认为市钱广泛流通的实际基础是钱票而非官铸铜钱，是很有道理的⑤。

纵观中钱的流通区域，包括山东、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吉林等省，几乎涵盖了中国北方的所有地区，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广泛流通一种货币制度，不是政府推行的，而是民间市场自发形成，只能说明一点：这种货币制度的载体有着天然的优势，优于以往的货币形式——银与铜钱，所以市钱的广泛流通与钱票的盛行是相辅相成的。因此，笔者推测钱票与市钱的盛行是同步的。而奉天地区的市钱在乾隆初年已经广泛流通，并被官府和民间普遍接受，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地方货币体系，奉天市钱市场的高度整合可能意味着钱票的盛行。奉天地区的钱票可能在乾隆朝以前就出现了。

钱票的流通范围和发行数量受制于市场的需求和发行机构的信用。商家进行多种努力促进钱票的发行与流通。有的地方，钱票的发行机构要在城市设置固定的钱票兑换点，保证钱票的持有者可以随时兑换到制钱⑥。有的商家进行连环互保，尽量减少挤兑的情况发生⑦。虽然经常有不良商家滥发钱票，或者由于各种原因产生挤兑现象，钱票还是在奉天地区广泛流通，在 1889 年皇家亚洲文会调查发现牛庄地区流通的钱票约有 300 万吊⑧。而一种叫做锦帖的钱票，可以在东至山海关，西至奉天城的区域内广泛流通⑨。奉天地区的钱票的发行机构，更多的将制钱作为准备金，发行的钱票的价值可能是制钱的几倍。

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奉天地区设立东三省官银号，发行以银为本位的纸币⑩，同时禁

---

① 刘辉、王晓光 《近代东北货币制度演变述略》，《大连近代史研究》2008 年第 5 卷，第 425 页。
② 静如 《东三省私帖调查记》（一），《银行周报》1929 年第 27 期。
③ 彭凯翔 《“京钱”考》，《江苏货币》，2013 年第 2 期；黄冕堂 《中国历代物价问题考述》，第 9 页。
④ H. B. Morse，*Abstract of information currency and measures in China*，第 433 页.
⑤ 彭凯翔 《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
⑥ 民国《锦西县志》卷 2《商业·币制》。
⑦ 民国《锦县志略》卷 17《礼俗》。
⑧ H. B. Morse，*Abstract of information currency and measures in China*，第 433 页。
⑨ 民国《兴城县志》卷 7《实业·钱法》。
⑩ 中国银行管理处编 《东三省经济调查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二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 1 页。

止私帖。不过，私帖在省城虽然用的少了，但各县仍然流通。所以此后奉天其他地区仍然是官方纸币和私帖并行，这种状态持续到民国初期。

晚清奉天地区，东钱的名称逐渐替代了小数钱，使用的频率更高，小数钱仅仅在官方记录中沿袭下来。据笔者所见文献来看，在嘉庆九年（1804）已经有官方档案提到东钱①。前文提到，在同治年间锦州府街市银行的银钱比价是以东钱为单位。光绪年间虽然盛京将军向皇帝奏报银钱比价时，还习惯性的使用小数钱的称谓，但“东钱”使用频率已经大大提高。在《奉天财政说明书》中，各地赋税征收习惯性的将银两折钱征收，折收制钱的不多，多是折征东钱②。

光绪三十一年（1905），奉天地区的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官钱帖500余万吊，称作“东钱票”，与东钱（小数钱）等值流通。东钱票是以银为本位，由于并不成功，奉天官方旋又改发小银元票，将东钱票陆续收回③。由此可见，清末官方最初发行钱票时，仍然希望遵循东钱钱制。但是，由于东钱票是以银为本位的，而银与制钱的兑换比率是波动的，因此东钱票不会与制钱保持固定比价，东钱票与以往的东钱是有本质区别的。

总之，最晚从乾隆初年开始，小数钱已经成为奉天地区的市钱，被民众及官方普遍接受并广泛流通，小数钱的出现应远远早于此。笔者认为，钱票作为小数钱的替代物，遵循小数钱的货币制度，在乾隆初年已经广泛使用。奉天地区的市钱，又被称为东钱，可能是关内民众对奉天及周边地区小数钱的习惯性称呼，使用频率随着移民在奉天地区的增加而大大提高。

三、小数钱与制钱的兑换比率

小数钱与制钱的兑换十分复杂，为了讨论方便，本文主要论述一吊小数钱与制钱的兑换比率，即一千文小数钱相当于制钱多少文。需要说明的是，清朝初年关于钱价的文献很少，本文忽略各地的价格差异，视奉天地区是一个高度整合的市场。当然，清朝末年奉天各县小数钱与制钱的兑换比率有较丰富的记载，本文也会一一详述。

1. 奉天地区市钱与制钱的兑换比率

奉天地区的小数钱与制钱保持十分复杂的兑换关系，根据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1920年代关于东北地区私帖的调查报告，将市钱与制钱的兑换比率绘制表格如下:

表1　奉天地区市钱与制钱的兑换制度

市钱	数量（文）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制钱	数量（文）	2	3	5	6	8	10	11	13
市钱	数量（文）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制钱	数量（文）	16	32	48	64	80	96	112	128

资料来源：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编　《滿洲に於ける私帖》，《经济资料》第15卷第5、6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出版，1929年，第12页。

由表1可见，10文市钱可以换到2个制钱，但20文市钱仅可以换到3个制钱，100文以内的市钱与制钱的兑换并无规律可言；100文市钱可以兑换16个制钱，200文市钱可以兑换32个，成百的市钱与制钱兑换按照比例增加，呈现规则的递增趋势，市钱1000文可以兑换制钱160个，即制钱160个当市钱1吊。市钱与制钱的兑换在实际生活中还要复杂，市钱1吊与制钱的兑换数

---

① 朱批奏折，嘉庆九年三月十二日盛京将军富俊等奏，档案号：04－01－08－0163－057。

② 《清光绪年二十二省财政说明书·直隶奉天卷》，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年，第185页。

③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中华书局，1964年，第1010页。

量并不是完全固定，会略有变化。

2. 每吊小数钱与制钱的兑换比率

盛京户部牛马税虽然征收小数钱，交库时还要兑换为制钱上交，因此两者的兑换比率常常被记录在会典中，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留下最早的记载，如下:

> 奉天牛马税四千八十八两，凡旗民贸易牛马驼羸计价一两收税银三分；驴每头收小数钱七百文（以制钱三十三文为一百）；每羊收税银五分，猪计价每千钱收小数钱三十文。边猪（谓贩来者）收小数钱百文；圈猪（谓自畜者）收小数钱九十文（旧例汤税乾隆四年革除）。①

由上述材料可知，奉天牛马税在市场征税时，除了银两，也征小数钱，收齐的小数钱要兑成制钱，按照“以制钱三十三文为一百”的比率兑换。如此说来，两者的兑换比率是制钱 330 文当小数钱 1000 文。

但需要注意的是，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的记载没有提到具体时间，因此并不意味着“制钱三十三文为一百”是乾隆朝的实际情况。事实的确如此，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关于苇税征收的资料显示，在乾隆五年（1740），牛庄地区制钱与小数钱的兑换比率已经达到制钱 167 个当小数钱 1000 文，如下:

> （乾隆）五年议准牛庄交纳苇税，向因割草人交银不便，每银一两，征小数钱六千六百文，合制钱一千一百文，征足易银交库完款。②

由上述可知，乾隆五年牛庄地区小数钱 6600 文合制钱 1100 文，制钱与小数钱的兑换比率为约制钱 167 个当小数钱 1000 文，与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所记载的“制钱三十三文为一百”差异很大，笔者认为苇税的记载更为可信。

虽然乾隆朝的记载被此后的会典沿用，但仅是因循抄录而已③。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曾提到“今京师钱以三十为陌，亦宜禁止”，有人认为这是清初的记载④，光绪年间官至长春知府的杨同桂也曾提到，清初京师曾以制钱“三十三文为一百”⑤，由此推测，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记载的奉天地区“制钱三十三文为一百”，很可能是清朝初年牛马税征收的情况，虽然此后实际情况发生变化，但《会典》并没有更改。

乾隆三十四年（1769），奉天地区的骁骑校察罕呢堵等在押解犯人时，先后两次收受贿赂，分别为小数钱 3700 文和 3800 文，都约合银 6 钱⑥。如果以银一两合制钱一千文计算，相当于制钱 158 至 162 个兑换小数钱 1000 文。

至乾隆五十九年，奉天地区小数钱下跌，与白银的兑换比率甚至达到 1: 7500 文左右⑦。有记载表明，小数钱的价值下跌是全国性的制钱下跌引起的，乾隆五十九年，奉天地区白银 1 两可兑换制钱 1200 余文⑧。而 1 两白银又合小数钱 7500 余文，如此推算，是年制钱 160 文兑换小数钱 1000 文。

嘉庆五年（1800），奉天府被革番役李德玉在宁远州借贷案中，提到“小数钱一百吊，合计大制钱十六千五百文”，计算得出制钱 1000 文合小数钱 6060 文，即制钱 165 文兑换小数钱 1000

---

①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47，《关税上》。
② 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725，《盛京工部·苇税》。
③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234，《户部》。
④ 彭凯翔《“京钱”考》，《江苏货币》2013 年第 2 期。
⑤ 杨同桂《沈故》卷 3，见《辽海丛书》，辽沈书社，1984 年，第 300 页。
⑥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盛京刑部侍郎朝铨奏，档案号: 04 -01 -16 -0049 -021。
⑦ 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725，《盛京工部·苇税》。
⑧ 朱批奏折，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十八日盛京将军琳宁奏，档案号: 04 -01 -35 -1344 -011。

文①。这一兑换比率，与晚清福格在《听雨丛谈》中记载的制钱 165 文兑换东钱 1000 文的比率完全相同②。

由上述可知，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制钱与小数钱的兑换比率是固定的，以百年为尺度，清朝初年至乾隆初年，制钱与小数钱的兑换比率不断上升，此后基本稳定。在清朝初年，奉天地区的小数钱是以制钱 330 文当小数钱 1000 文；至乾隆五年（1740），制钱 167 文当小数钱 1000 文；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制钱 160 文当小数钱 1000 文；在嘉庆五年（1800），制钱 165 文兑换小数钱 1000 文。

3. 光绪年间小数钱与制钱之间的兑换比率

在《兴京旗人档案史料》中有大量关于兴京官兵发放俸饷的记录，多处提到光绪年间制钱与当地市钱的兑换。此外，还有两条是甲午战争期间军队补给涉及的锦州府地区的制钱与小数钱的兑换记录，详见表 2。

表 2 主要是兴京地区旗人俸饷调拨和发放的记录，除了兴京本地的厘捐、余租收入及库存外，还从省城、承德县及铁岭调拨款项。领到制钱或银两后，多合算为当地市钱。以第 1 项记录为例，原文记载“由库领制钱七百串，合钱四千二百七十千”。即制钱 700 串兑换“钱”4270 千文，虽然这里的“钱”没有具体说明，从整体的资料来看，显然是指当地的市钱。

在第 21 项记录中，则明确记载银三千两，“合制钱四千七百四十五串，合小数钱二万八千九百四十九吊九百九十六文”，即千文小数钱合制钱 164 个③。

第 19 项记录来源于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期间，在复州调拨俸饷的记录“共发给制钱八百串六一，合小数钱四千八百八十吊。……由卑州库存仓储项下动支，理合造具清册。”④由此得到复州地区制钱 164 文兑换小数钱 1000 文。

第 20 项记录来源于光绪二十七年，盛京将军增祺上报锦州库存钱款被俄人抢劫的记录，“共合小数钱二十万零一千六百吊，合制钱三万二千六百七十四串二百三十文零二分。”⑤ 由此可知制钱 162 文合小数钱 1000 文。

在表 2 中，兴京、铁岭、锦州、复州及奉天省城各处的市钱，约 1000 文兑换制钱约 160 或 162 或 164 个，以此推测各地的市钱都是小数钱。

相同地区不同的款项来源，制钱与小数钱的兑换比率也可能不同，例如光绪三十年，兴京地区在俸饷调拨时，一直有两个固定的兑换比率，即制钱 164 或 160 个兑换小数钱 1000 文，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某种惯例，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由上述可知，虽然制钱在咸丰年间就已经停铸，而当十以上的大制钱由于民间不用也停铸了。⑥ 但在乾隆初年以来，奉天地区制钱与小数钱的兑换比率非常稳定。不同的地区可能略有差异，即小数钱 1000 文兑换的制钱数量，从 167 至 160 文之间略有变化。

四、小数钱与银两之间的比价

1. 小数钱与银两之间的比价（1644—1820）

---

① 朱批奏折，嘉庆五年四月二十日盛京将军傅森等奏，档案号：04－01－01－0480－020。

② 福格《听雨丛谈》，第 152 页。

③ 赵焕林、杨丰陌主编《兴京旗人档案史料》，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 年，第 392 页。

④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四册），中华书局，1993 年，第 371 页。

⑤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忠义军抗俄斗争档案史料》，辽沈书社，1984 年，第 54 页。

⑥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 562 页。

表 2　光绪年间奉天地区小数钱与制钱的兑换比率

序号	年份	地点（取钱）	机构（取钱）	制钱（串）	合小数钱（文）	千文小数钱合制钱数（文）	页
1	1885	兴京	库	700	4270000	164	63
2	1885		道库	334. 71	2041730	164	63
3	1885	兴京		1257. 29	7858060	160	63
4	1886	兴京	库	1200	7320000	164	66
5	1886	铁岭		1000	6100000	164	66
6	1886	兴京		92	575000	160	66
7	1887	兴京	捐输局	1642. 793	10021040	164	71
8	1887	承德		1031. 26	6290350	164	71
9	1887	兴京		70	437500	160	71
10	1887	兴京	捐厘局	2292	13981200	164	77
11	1888	兴京		2292	13981200	164	84
12	1888	兴京		60	375000	160	85
13	1889	兴京	捐输局	2288. 4	13959240	164	89
14	1889	兴京	库	1290. 8	7873880	164	92
15	1889	兴京		1000	6250000	160	93
16	1889	兴京		484	3025000	160	93
17	1889	兴京		58. 8	367500	160	93
18	1890	兴京	厘捐局	1874	11431400	164	98
19	1894	复州		800. 061	4880000	164	371
20	1901	锦州		32674. 2302	201600000	162	54
21	1908	省城		4745. 901	28949996	164	392

资料来源：第1—8，10、11、13—16、18、21 项数据来源于赵焕林、杨丰陌主编《兴京旗人档案史料》，页码详见表 2，其他亦同；第9、12、17 的制钱数据是根据原文记载计算而来；第19 项数据来源于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四册）；第20 项数据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忠义军抗俄斗争档案史料》，辽沈书社，1984 年。

清朝初年没有直接记载银两与小数钱比价的资料，笔者用“制钱三十三为一百”为依据推测，以清初库平银 1 两兑换制钱 1000 文计，库平银 1 两则可兑换小数钱 3030 文。

在乾隆五年（1740），库平银一两兑换小数钱 6600 文，资料来源于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关于苇税的记录：

（乾隆）五年议准牛庄交纳苇税向因割草人交银不便，每银一两，征小数钱六千六百文，合制钱一千一百文，征足易银交库完款。兹应照户部所收奉天牛马税例，以小数钱六千文，合制钱一千文，折银一两。①

笔者认为银 1 两兑换小数钱 6600 文是当时的时价。这里的银，应是库平银。

乾隆六年，盛京骁骑校胡勒思肯在抓赌的过程中接受赌博人犯梁德的贿赂，总计小数钱四十九千，合银八两一钱②。由此可知，银一两约合小数钱 6049 文。这里的银，应指盛京城市平银，即后来的沈平银。

乾隆三十四年，奉天地区的骁骑校察罕呢堵等在押解犯人时，先后两次收受贿赂，分别为小数钱 3700 文和 3800 文，约合银 6 钱③。可以计算出当时市平银 1 两银子，约可以兑换到小数钱 6167 至 6333 文。

至乾隆五十九年，奉天地区小数钱下跌。据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记载：

乾隆五十九年议准牛庄征收苇税钱文，由该监督每征小数钱六千文，易银一两交库，现

---

① 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725，《盛京工部·苇税》。
②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台湾），乾隆六年六月六日刑部尚书兼内务府总管来保题参，登录号：071110－001。
③ 朱批奏折，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盛京刑部侍郎朝铨奏，档案号：04－01－16－0049－021。

因钱价甚贱，每银一两易小数钱七千四五百文不等，若令该监督将钱易银交库，不无赔累，应将此项苇税暂行实收本色银两，俟将来钱价稍昂，仍照旧例办理。①

由此可知，至乾隆五十九年，银 1 两与小数钱的比价已经上升到 1：7500 文左右，盛京户部如果仍然按照 1：6000 文征收小数钱，然后再到市场中兑换成银两，巨大的差额已经无法承受，因此要求改征本色银两，希望钱价稍长时再遵旧例。清廷同意了盛京户部的请求，直到清末一直以银两征收苇税。这也从侧面反映银与小数钱的兑换比率没有走向下降。

有记载表明，小数钱的价值下跌是由于全国性的制钱价格下跌引起的，乾隆五十九年，奉天地区白银 1 两可兑换制钱 1200 余文，盛京将军琳宁等建议官兵俸饷原来搭放制钱的部分改放银两，以减少奉天市场中的制钱流通数量，以此提高制钱的价格。②

嘉庆四年（1799），奉天地区市场中银 1 两约合制钱 1200 文至 1300 文③，如果按照制钱与小数钱 1：6.25 的兑换比率计算，此时银 1 两约合小数钱 7500 至 8125 文。可以看到嘉庆初年制钱仍在下跌。

由上述可知，乾隆初年以来制钱价格下跌，银价上升，因此银两兑换的小数钱也相应上涨。

2. 小数钱与银两比价的剧烈波动（1821—1874）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白银大量外流引起银价大幅上涨，银两与小数钱之间的兑换比率也迅猛提高。

道光二十二年（1842），银 1 两兑换小数钱 10169 文。是年，盛京将军在赈济灾民时提到银六钱合制钱 1000 文，计算得到银 1 两合制钱 1667 文，以制钱 160 文当小数钱 1000 文的比率计算，银 1 两约合小数钱 10419 文④。

至咸丰四年（1854），银极贵，奉天府城市场中银 1 两约合制钱二串六百七文，以制钱 160 文当小数钱 1000 文的比率计算，银 1 两约合小数钱 16875 文⑤，这也是奉天府银价最高的时期。

有记载表明，自同治初年开始，银价回落，同治二年（1863），奉天府市平银 1 两约合小数钱 10600 文⑥，基本与 1842 年持平，回落到鸦片战争初期的水平。

同光之际，银价虽有涨落，但基本保持平稳，没再出现咸丰年间的急涨情况。同治三年，锦州境内盗贼出没，锦州副都统带领官兵镇压，花费市平银 16383.61 两，合东钱 129430 千文，计算得出锦州银 1 两合小数钱（东钱）7900 文⑦。沈平银（盛京市平银）1000 两约合锦平银（锦州府市平银）989.12 两⑧，以此折算，是年盛京银 1 两约合小数钱 7814 文。

笔者查到同治后期的街市银钱比价，并根据沈平银与锦平银的兑换比率，计算出盛京地区的银与小数钱比价。同治八年，锦州街市银行银 1 两合小数钱 9690 文⑨，则是年盛京银 1 两约合小数钱 9585 文。同治九年，锦州街市银行银 1 两兑换小数钱 10980 文，则是年盛京银 1 银兑换小数钱 10861 文⑩。同治十一年，锦州街市银行银 1 两兑换小数钱 11250 文⑪，则是年盛京银 1

---

① 托津等奉敕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725，《盛京工部·苇税》。
② 朱批奏折，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十八日盛京将军琳宁奏，档案号：04－01－35－1344－011。
③ 朱批奏折，嘉庆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盛京将军琳宁等奏，档案号：04－01－03－0139－016。
④ 录副奏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日盛京将军禧恩奏，档案号：03－2838－060。
⑤ 朱批奏折，咸丰四年五月十八日盛京将军承志等奏，档案号：04－01－01－0851－020。
⑥ 朱批奏折，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八日盛京将军玉明奏，档案号：04－01－35－0970－020。
⑦ 朱批奏折，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朱批奏折》盛京将军玉明奏，档案号：04－01－01－0883－023。
⑧《东三省通货调查报告书》，见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辑及发行，《中国银行通信录》，1920 年第 61 期，第 49 页。按：沈平银即奉天省城的市平银，锦平银即锦州府的市平银。
⑨ 朱批奏折，同治八年十二月初八日盛京将军都兴阿等奏，档案号：04－01－01－0906－007。
⑩ 朱批奏折，同治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盛京将军都兴阿等奏，档案号：04－01－01－0912－054。
⑪ 朱批奏折，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盛京将军都兴阿等奏，档案号：04－01－01－0920－091。

两合小数钱 11128 文。

光绪年间盛京的银钱比价数据最为丰富，盛京将军会按月奏报盛京城银两与小数钱比价。可能鸦片战争之后银价的剧烈上涨，给地方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奉天地区的赋税以往银钱兼收，八旗官兵的俸饷也是银钱按比例发放，银价迅速上涨对奉天地区旗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从光绪二年（1876）开始，盛京将军向皇帝奏报的粮价单上增加了银钱比价的内容，相关记录持续到光绪末年，相关记录共有 607 个，笔者挑选出 11 月份或接近 11 月份的数据整理出来，连同乾隆以来的银钱比价，汇编成表 3。

由表 3 可见，绝大部分银两与小数钱的兑换比率数据是来自于盛京城，显然与盛京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有关。来自于牛庄、锦州城的银钱比价数据虽然不多，但考虑到可以对不同地区的银钱比价进行比较，也纳入表中。

光绪年间盛京城银两与小数钱的兑换比价数据是最为丰富的，从 1876 年到 1906 年的近 30 年间，我们掌握完整的库平银和市平银与小数钱的兑换比率数据，由此算出 30 组对应数据的相关度（系数）为 99.43%。也就是说，两组数据的相关程度极高，因此认为两组数据存在对应的比例关系。在库平银与小数钱兑换比价缺乏的年代，本文依据比例关系进行推测。

具体过程如下，从 1876 年至 1906 年的近 30 年间，盛京城每两库平银兑换小数钱数量的平均值约为 10101 文，每两市平银兑换小数钱数量的平均值约为 9770 文，前者与后者的比值为 1.033895214。我们认为这个比例适用于盛京城所有年份两者的比值。

根据表 3 数据绘制的图 1，可以更为直观地显示盛京地区市平银、库平银与小数钱兑换比率的变化趋势。

由图 1 可见，库平银、市平银与小数钱的兑换比率的变化趋势极其相似，印证了两组数据相关度极高的计算结果。乾隆初期银两与小数钱的比价十分平稳，从乾隆中期至道光末年，奉天地区银价上升，70 余年每两市平银兑换的制钱数量增加了 60% 左右，年增长率约 0.65%。如果从银钱比价的变化趋势来看，经济呈现温和的紧缩状态。在道光末年至咸丰四年（1854），银价剧烈上涨，10 余年增长了约 66%，年增长率约为 4.31%。自同治十年（1871）起，白银价格下跌，铜价上涨。由此引起制钱价格上涨，银价下跌，奉天地区的银价也呈现相同趋势。光绪末年，奉天地区的银价两次经历快速上涨、下降的过程，经济呈现剧烈波动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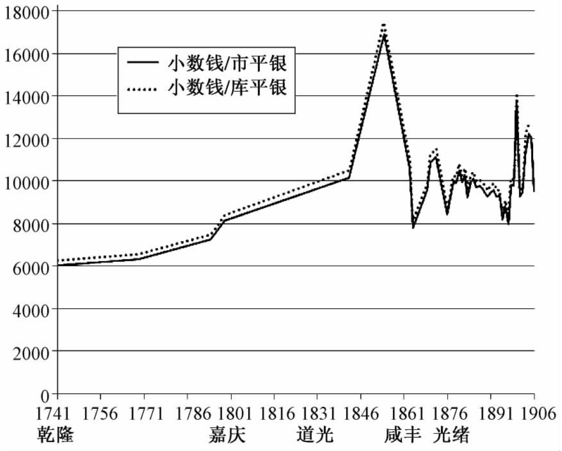

图 1 乾隆初年以来奉天地区银两与小数钱比价（文/两）示意图

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18 世纪中后期奉天地区的钱价略高于华北[①]和江南地区[②]。进入 1840

---

① 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附录部分。

② ［日］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波动》，刘迪瑞等译，第 299 页。

表 3　乾隆初年以来奉天地区银两与小数钱比价（1740—1906）

序号	年	月（阴历）	地点	小数钱（文/两）（库平银）	小数钱（文/两）（市平银）	档号或页码
1	1740		牛庄	6600		
2	1741		盛京	6254	6049	071110－001
3	1769			6548	6333	04－01－16－0049－021
4	1794		盛京	7500	7254	
5	1799		盛京	8400	8125	
6	1842			10514	10169	
7	1854		盛京	17447	16875	
8	1863		盛京	10959	10600	
9	1864		锦州		7900	
10	1864		盛京	8079	7814	
11	1869		锦州		9690	
12	1869		盛京	9910	9585	
13	1870		锦州		10980	
14	1870		盛京	11229	10861	
15	1872		锦州		11250	
16	1872		盛京	11505	11128	
17	1876	10	盛京	8670	8411	94－95
18	1878	11	盛京	10240	9930	04－01－25－0518－030
19	1879	10	盛京	10230	9920	04－01－25－0522－012
20	1880	11	盛京	10830	10500	04－01－25－0520－009
21	1881	10	盛京	10270	9960	04－01－24－0159－043
22	1882	11	盛京	10620	10300	04－01－25－0523－020
23	1883	9	盛京	9530	9240	04－01－25－0524－012
24	1884	11	盛京	10240	9930	04－01－25－0525－027
25	1885	11	盛京	10420	10100	94－360
26	1886	11	盛京	10010	9700	04－01－25－0527－043
27	1887	11	盛京	10080	9770	04－01－24－0160－077
28	1888	11	盛京	9960	9660	04－01－25－0532－018
29	1889	11	盛京	9740	9440	04－01－25－0536－009
30	1890	11	盛京	9560	9270	04－01－25－0539－013
31	1891	11	盛京	9800	9500	04－01－25－0541－017
32	1892	11	盛京	9870	9570	95－392
33	1893	11	盛京	9560	9270	04－01－24－0162－099
34	1894	11	盛京	9590	9300	95－770
35	1895	11	盛京	8460	8200	95－975
36	1896	11	盛京	9080	8800	96－98
37	1897	11	盛京	8200	7950	04－01－24－0164－033
38	1898	11	盛京	10130	9820	96－477
39	1899	11	盛京	10070	9760	96－669
40	1900	6	盛京	14130	13700	96－765
41	1901	11	盛京	9550	9260	97－19
42	1902	11	盛京	9790	9490	97－128
43	1903	11	盛京	12240	11190	97－286
44	1904	9	盛京	12610	12220	97－409
45	1905	11	盛京	12479	12070	97－625
46	1906	11	盛京	9832	9510	97－745

资源来源：1、数据 17、25、32，34－36，38－46 来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 1996 年版，页码格式为（辑－页码）。

2、数据 3，18－24，26－31，33，37 来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

3、数据 2 来源于台湾明清内阁大库档案。

4、数据 1、4—16 均为计算所得，过程及数据来源详见正文。

5、笔者目前没有找到 1877 年银两与小数钱比价数据，此年空缺。

年前后十余年中，奉天与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银价暴涨和回落的过程，然后震荡下降。自同治

十年（1871）起，欧洲国家相继采用金本位制，此后白银价格下跌，铜价上涨①。在清朝的最后十余年中，华北、江南等地的银价继续回落，但奉天地区的银价走势则完全相反，经历两次快速上涨、下降的过程，呈现剧烈波动状态。引起东北地区银钱比价呈现不同变化趋势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需要进一步探讨。

五、结论

奉天省的市钱称为小数钱或东钱，实行十进位制，按照文、成、百、吊递进，10 文为 1 成，10 成为 1 百，10 百为 1 吊。市钱的货币实体有两种，其一是制钱，制钱约 160 个当市钱 1 吊;其二是钱票，各地流通的钱票很多是按照市钱制度发行的。笔者认为战争与社会动荡使奉天地区的铜钱极度缺乏，以制钱约 160 个当市钱 1 吊的市钱，在清朝初年出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如果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也是有限的，因此钱票的广泛流通应该晚些。清代奉天地区赋税和物价，常常用钱计算，如果没有特别指出为制钱，就是以市钱为单位，需要特别小心。

奉天省市钱的流通区域，以盛京为中心，辐射到与直隶、内蒙古、吉林等相邻省份的交界地区，笔者推测，支撑奉天省市钱制度活力的是纸币，即是钱庄、当铺、粮栈、油坊、烧锅、杂货店等店铺发行的纸币，这种非官方性质的纸币数量极其庞大，按照市场规律孕育而生。虽然各种纸币的信用与流通区域各不相同，但大部分纸币按照市钱的钱制发行，与制钱保持固定的兑换比率，已经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纸币市场，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

18 世纪中期以后，奉天地区的银价上升，促进了中国地方市钱体系的发展。银价上涨后，百姓更趋向于保留白银，支出不断贬值的铜钱，用于流通的铜钱增加了。由于国家提供的铜钱数量严重不足，钱票作为铜钱的替代物，由于需求的增加而迅速发展。

源于民间的商业力量推动了地方货币体系的整合，成果远胜于政府多年的努力。商业实体往往按照人们熟悉的市钱制度发行纸币，和制钱保持固定的兑换比率。纸币不仅克服了铜钱不利于远距离运输的缺陷，而且省去了数钱的麻烦和费用，因此大受欢迎。纸币的发行者虽然是地方性的商业实体，流通的范围会受到信用的限制，但一些商家的纸币因为信誉卓著，可以在省内大部分地区流通。在民间商业力量的推动下，市钱制度与纸币相结合，促进了清代后期地方货币体系的整合与扩张。

主要参考文献

[1] 户科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2] 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3] 允禄等监修 《大清会典》（雍正朝），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79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 年。

[4] 托津等奉敕纂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690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91 年。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嘉庆查办盛京民典旗地史料》，《历史档案》1987 年第 1 期。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朝朱批奏折》，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

[7] 王业键 《清代经济史论文集》（一），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 年。

[8] 石长有 《清代地方私帖图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

[9] 彭凯翔 《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

[10]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①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第 623 页。

[11] 王革生 《清代东北货币金融述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
[12] 戴建兵 《中国钱票》，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
[13] 中国银行管理处编 《东三省经济调查录》，见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 20 辑，台北; 文海出版社，1991 年。
[14] 福格 《听雨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15] 《清光绪年二十二省财政说明书·直隶奉天卷》，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 年。
[16]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 《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 年。
[17]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21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6 年。
[18] 杨同桂 《沈故》，载 《辽海丛书》，沈阳：辽沈书社，1984 年。
[19] 赵焕林、杨丰陌主编 《兴京旗人档案史料》，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 年。
[20] 戚其章主编 《中日战争》（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
[21]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忠义军抗俄斗争档案史料》，沈阳：辽沈书社，1984 年。
[22]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藏。
[23] 《东三省通货调查报告书》，见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编辑及发行，《中国银行通信录》，1920 年。
[24]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编 《滿洲に於ける私帖》，《经济资料》，第 15 卷第 5.6 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出版，1929 年。
[25] Frank H. H. King，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845－189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6] H. B. Morse，Abstract of information currency and measures in China，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90，上海图书馆整理 《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第 13 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 年。

Analysis of Market Currency in Fengtian Area in Qing Dynasty

REN Yuxue，WU Yang（Department of History，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renyuxue@sjtu.edu.cn，wuyangsjtu@gmail.com）

The monetary system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known as “market currency”（money that circulated in a particular market） systems，were gradually formed in regional markets in the Qing dynasty. An economic area，whose market currency was decimalized，came into existence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economic area was centered at Fengtian Province，and it spread to adjacent territories，such as Zhili，Inner Mongolia and Jili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decimal currency and analyzes its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in Fengtian. The price ratios between decimal currency and market currency，between decimal currency and silver after Qianlong period，are systematically unravel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author conjectures that money notes issued by various stores supported the dynamism of the monetary market of market currency. Such unofficial notes were cir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netary system. Ultimately，market currency formed a huge paper money market，which existed until the end of Qing dynasty.